

# 数字时代背景下哈贝马斯社会整合理论再审视

王炳策

海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海南 海口

收稿日期: 2026年1月26日; 录用日期: 2026年2月17日; 发布日期: 2026年2月28日

## 摘要

社会整合是每个时代都需要面对的重大问题, 数字时代的数字化、智能化等新特征重塑了社会运行形态, 也使社会整合面临新挑战。哈贝马斯社会整合理论给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与内在矛盾、理解规范性与事实性相统一的社会整合问题提供了关键视角。数字时代下, 算法主导的交往模式引发交往能力退化、社会认同消解、合法性侵蚀等危机, 亟需依托经典理论探寻破解路径。将哈贝马斯的社会整合理论与数字时代特征相结合重新思考, 不仅为批判数字时代结构性矛盾提供分析工具, 更为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数字社会有序发展提供重要理论支撑与实践启示。

## 关键词

哈贝马斯, 数字时代, 社会整合

# Revisiting Habermas' Theory of Social Integration in the Digital Age

Bingce Wang

School of Marxism, Hainan Normal University, Haikou Hainan

Received: January 26, 2026; accepted: February 17, 2026; published: February 28, 2026

## Abstract

Social integration is a critical issue that every era must confront. The digital age, characterized by digitization and intelligence, has reshaped the operational dynamics of society while introducing new challenges to social integration. Habermas's theory of social integration offers a pivotal lens for examining the new transformations and inherent contradictions of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as well as understanding the unification of normative and factual dimensions in social integration. In the digital era, algorithm-dominated modes of interaction have triggered crises such as the decline of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the dissolution of social identity, and the erosion of legitimacy,

necessitating the exploration of solutions grounded in classical theories. Revisiting Habermas's theory of social integration in light of the digital age not only provides analytical tools for critiquing structural contradictions in this era but also offers significant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insights for advancing China's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and the orderly development of a digital society.

## Keywords

Habermas, Digital Age, Social Integratio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 1. 引言

社会整合作为社会学研究中的经典问题，是指对社会中的各个要素加以协调，构建统一运行体系，以推动整个社会实现平稳且和谐的发展。伴随社会的不断发展以及对社会整合探索的不断深化，社会整合这一问题已然成为众多思想家研究的重要内容。哈贝马斯身为当代最具影响力的社会学家之一，其社会整合理论构建起一个宏大且精细的思想体系。

进入数字时代，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重大变化，数字信息应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数字时代的社会具有新的特征，包括数字化、智能化、高效性、虚实融合等特征[1]。因此在数字时代背景下，深入探究哈贝马斯的社会整合理论，可为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内在矛盾及其表现形态等方面提供重要视角。同时，这也有助于从规范性与事实性相统一的维度理解社会整合问题，对推动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 2. 哈贝马斯社会整合理论的主要内容

哈贝马斯社会整合理论的提出，是为了回应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系统性危机。他通过批判性地继承与发展马克思、韦伯及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传统，并实现哲学上的语言学转向，最终将社会整合的基础锚定于交往理性的主体间性沟通活动之上，为克服现代社会的分裂与危机提供了一条独特路径。

哈贝马斯社会整合理论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以“系统 - 生活世界”为分析框架，以“生活世界殖民化”为危机的诊断，以“交往理性”为整合路径，最终目标是实现一个在价值多元背景下，既能保障个人自由，又能维持社会团结的社会整合范式。

### (一) 社会整合危机的逻辑起点：“系统 - 生活世界”分析框架

哈贝马斯对社会整合危机的分析是建立在“系统 - 生活世界”框架之上的。“生活世界类似发言者和听众所遇到的先验的地方，在这种地方，他们可以相互提出要求，就是说，他们的表述与世界(客观世界、社会世界或者主观世界)相适应，并且在这里他们可以批判和证实这些运用要求，排除意见不一致，取得意见一致。”[2]由此可以看出，生活世界是通过交往理性来运作，它以语言为媒介，旨在达成人与人的相互理解和共识。在哈贝马斯看来，“系统主要是一种作为强制性力量的社会”[3]，是指社会物质再生产的功能性领域，该领域通过工具理性来运作，通过非语言的媒介来调节人的行为，旨在实现高效和稳定。系统由经济、政治、文化三部分构成，社会系统可以分为经济系统、政治系统和文化系统。哈贝马斯社会整合理论的提出源于晚期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危机，这一危机的根源在于生活世界殖民化，而生

活世界殖民化是系统整合和社会整合的不平衡，系统和生活世界的不协调引起的，因此可以说“系统 - 生活世界”分析框架是哈贝马斯社会整合危机研究的逻辑起点。

### (二) 现代性危机的根源：“生活世界殖民化”

哈贝马斯指出，现代社会的根本危机在于系统与生活世界之间的平衡被打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系统和生活世界发生分离，这本身是现代化的进步，也是人类理性的进步。然而工具合理性主导的系统不断扩张，由交往合理性主导的生活世界不断收缩，就导致系统侵蚀和控制了生活世界，从而导致“生活世界殖民化”。“生活世界殖民化”在哈贝马斯那里指的是以“金钱”为媒介的经济体制和以“权力”为媒介的官僚体制侵蚀了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从而控制了生活世界，使得生活世界殖民化。原来由沟通和往来来协调的公共领域，日益被市场的商品逻辑和官僚体制的行政命令所主导。

由于金钱媒介和权力媒介取代了语言并发挥作用，人们对于任何事情都向金钱和权力看齐，金钱和权力成为衡量人生意的唯一尺度。每个人都把对方看作是达成自己目标的工具，工具理性盛行，价值理性缺失，人变成了单向度的人。在这种社会下每个人的目标都是金钱和货币，统一的价值和共识不再存在，社会整合出现了严重危机。因此生活世界殖民化是现代性危机的根源，也是哈贝马斯社会整合理论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 (三) 社会整合的路径：“交往理性”

哈贝马斯以“系统 - 生活世界”为分析框架为研究社会整合危机的逻辑起点，指出现代性危机的根源就是系统和生活世界不协调而导致的“生活世界殖民化”。因此哈贝马斯提出用“交往理性”来抵抗“工具理性”的侵蚀，实现生活世界合理化，解决社会整合危机。

哈贝马斯指出“生活世界的合理性可以理解为在沟通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合理性潜力的连续体现”。([4], p. 208)因此交往的重要性在解决社会整合危机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哈贝马斯说：“交往理性概念的内涵最终可以还原为论证性话语在不受强制的前提下达成共识这样一种核心经验。其中不同参与者克服掉了他们最初的那些纯粹主观的信念，同时，为了共同的合理信念而确立了主观世界的同一性和主体间性”。([4], p. 11)

要理解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需要理解工具理性这一概念，工具理性关注如何用最有效的手段达成既定目标。它是单向的、策略性的，主体把外界视为实现自己目标的工具或障碍。这种理性主导着经济系统和政治系统。而交往理性是内在于人类语言使用中的理性潜能，其核心目标是达成理解，它是双向的、主体间的。当人们进行真诚对话时，会提出真诚性、正当性、真诚性的有效性主张，并期待得到对方的认可。社会整合的起点就是日常的言语交往，当言说者对某事件发表意见，提出真实性、正当性和真诚性的要求时。如果听者发生质疑，双方便进入商讨阶段，用理由和证据来支持或反驳这些观点。商讨最终的目标不是为了压制对方，而是为了达成基于理性的共识。这种理性的共识意味着双方对某一事实或规范形成了共同的理解和认可。这种相互认可就构成了一种社会纽带。每一次成功的对话都生产着社会整合的力量。

形成这种整合力量是分散的需要一个空间来汇集、过滤和放大这些理性讨论后达成的共识，这种空间就是公共领域。哈贝马斯说：“公共领域最好被描述为一个关于内容、观点，也就是意见的交往网络；在那里，交往之流被以一种特定方式加以过滤和综合，从而成为根据特定议题集束而成的公共意见或舆论”。([5], p. 445)在公共领域中人们就公共问题展开讨论，这些讨论形成了公共舆论，这些公共舆论不是简单的民意相加，而是经过理性讨论后的具有说服力地达成共识的意见。公共领域就成了将交往理性化为实际力量的空间。

为了确保公共领域的有序运行需要对其进行制度化保障。分散的公共舆论要稳定地整合社会，就需要转化为具有约束力的制度。这是理论转化为现实力量的关键一步。仅仅通过语言的讨论和对话的协商

来达成社会整合是远远不够的，哈贝马斯指出“语言发挥社会整合功能的合理性潜力，通过交往行动而得到开发、动员，并在社会进化过程中得到释放。现代法之出现，是为了填补不堪社会整合之重负的社会秩序的功能缺口”。([5], p. 453)因此法律的规范性效用可以为社会整合提供制度保障效果。只有所有公民在理性的立法讨论中可能同意的法律，才是正当的、合法的。这意味着法律的合法性源泉不再是神意或传统，而是公民的交往理性。

总而言之，哈贝马斯通过人们的交往理性在日常对话中提出有效性主张，在公共领域达成并凝聚成为共识，最后通过法律提供保障来实现社会整合。这种社会整合的目标是最终实现社会合理化。

#### (四) 社会整合理论的目标：社会合理化

哈贝马斯的社会整合理论最终指向社会合理化，这并非指工具理性的无限扩张，而是指生活世界的合理化。哈贝马斯将社会分为两个领域即生活世界和系统，要实现社会合理化的目标，需要实现生活世界和系统两个领域合理化。

哈贝马斯认为想要实现生活世界的合理化首先要通过交往理性实现交往行为的合理化。由于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人们的交往行为发生扭曲，对真善美的追求变为对金钱和权力的追捧，交往行为的病态会造成整个社会价值的缺失，因此需要通过交往理性来使得人们的交往行为合理化，使得人们的交往回到健康的轨迹上来。当社会整合不再依赖于非理性的权威和盲目的市场力量，而是依赖于人们持续的、自由的理性沟通与协商。社会在越来越高的程度上通过交往理性来协调其运作，这就是哈贝马斯所说的：“社会，就严格意义上的生活世界力量而言，是一种合法的秩序，依靠这种秩序，交往行为者通过建立人际关系而创立一种建立在集体属性基础上的团结”。[6]

### 3. 数字时代下社会整合面临的挑战

相较传统社会危机的简单延续，数字时代下算法作为新的媒介使得“生活世界殖民化”又有了新的表现形式。数字时代的社会整合危机不仅未得到解决，反而使人们更深地陷入数字泥潭，导致危机愈发严重。其危机表现主要体现在社会认同和公共价值的消解、合法性遭遇侵蚀、人类交往能力退化三个方面。

#### (一) 交往能力退化

社会整合的成功与否最终依赖于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行为。进入数字时代，数字媒介正在重塑人类的交往模式，这就导致人类的交往能力发生退化。

首先，人类交往环境发生改变。传统的交往是线下面对面对式的沟通交流，在数字时代的线上交往模式中，交往对象的面部表情、语气语调、身体姿态等非语言信息被冰冷的文字和千篇一律的表情符号取代，这些东西使得我们无法理解交往对象的真诚性和情感状态。这就导致沟通缺乏温度、误解频发，人们很容易对屏幕对面的交往对象充满冷漠和敌意，而非试图去理解和接纳。这就使得达成共识所需的相互信任和尊重难以形成。其次，交往模式流于形式而变得浅薄化。数字时代人们交往的场域主要在聊天软件中，这些软件将复杂的交往行为简单化为点赞、转发和短评等形式化的工作。深度思考后的耐心交流被快速化、情绪化、标签化的互动所取代，这使得人们习惯于表态而非论证、跟风而非理解。人们提出有效性主张并进行理性辩论的能力得不到锻炼而退化，交往行为变得浅薄化。最后，交往行为从理性沟通变为策略行为。在数字时代背景下，流量和关注成为目标，许多线上交往的本质不是真诚沟通，而是博得眼球的策略行为，交往的目的不是理性沟通，而是流量变现。当这种交往行为成为主流，语言从沟通的桥梁变成互相斗争的武器，社会整合所需要的合作基础也就不复存在。

#### (二) 社会认同消解

社会整合依赖于社会成员的共同价值和社会认同。然而，在数字时代，每一位社会成员都被算法束

缚在各自的网络空间内，导致整个社会的共同价值逐渐被数字所消解。

首先，算法推荐导致共识崩塌。数字时代下，算法推荐基于用户的偏好进行内容的投送，将人们困在同质化的信息环境中，人们只能接触到自己喜欢的内容和认同的观点，久而久之就认为自己认同的就是正确的，而忽视了社会共同价值。其次，流量逻辑使得共识的达成变得困难。在流量逻辑下，情绪煽动、制造对立的内容比严谨、客观的事实陈述更容易获得传播。情感上的共鸣和身份上的认同取代了事实，成为判断是非的首要标准。这就使得维系社会团结的共同价值被边缘化，社会成员没有了共同的价值认同将会进一步加剧社会整合的危机。最后，社会共同价值被平台消费化机制所溶解。

### (三) 合法性遭遇侵蚀

社会整合有赖于社会成员对共同体的归属感与对基本制度规范的合法性认同，然而数字时代的技术逻辑正在侵蚀这一基础。

首先，数字时代中网络成为人们表达想法的又一阵地，而网络中的水军和 AI 可以大规模制造虚假的民意来淹没真实的声音，散布不实的信息，大数据算法可以针对性地投放广告，进行精准的心理操控。这就导致公共舆论不再是人们自由、理性讨论的结果，而是被操纵和策划的产物。建立在这种舆论基础上的政治决策和法律，其合法性将会变得不再纯洁，公民的想法将被诱导。其次，数字时代的技术逻辑使得越来越多的公共决策依赖于算法，而这些算法是不透明的，公民难以理解其中的逻辑，也无法进行有效的民主监督。最后，网络信息是碎片化的，媒体根据热点来推送消息。一个严肃的议题尚未得到充分的讨论，就被新的热点所取代。社会缺乏持续关注和深入思考重大公共问题的能力。合法性需要通过持续的、深入的研究来维系，而日新月异的网络空间使得任何一个重大事件都能迅速被下一个热点所覆盖，合法性侵蚀不断加剧。

## 4. 数字时代下哈贝马斯社会整合理论的启示

尤尔根·哈贝马斯的社会整合理论，以其对“系统 - 生活世界”的辩证分析及“交往理性”的核心建构，为诊断现代性危机提供了范式。在数字技术深刻重构社会交往基本结构的当下，这一理论非但未显过时，反而以其深刻的规范性力量，为理解和纾解数字时代的社会整合困境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启示。

### (一) 为批判“数字生活殖民化”提供分析路径

哈贝马斯指出现代性危机根源在于生活世界殖民化，这一命题指出当金钱和权力为媒介的系统侵入并支配了以语言为媒介、以理解为取向的生活世界，便会导致意义和自由的丧失等现代性危机。

在数字时代背景下，重新对这一理论的阐释可以看出其重要的批判性。在数字时代的背景下，出现了平台资本，平台资本催生了以“数据”和“算法”为媒介的系统逻辑。这种逻辑不仅继承了传统的商品化倾向，更通过将人类交往行为本身数据化、商品化，实现了一种更为微观、深入和隐蔽的殖民。用户的注意力、社会关系和情感，均被捕捉并纳入资本增殖的循环之中。这使得工具理性对生活世界的入侵，从宏观制度层面渗透到日常交往之中。

哈贝马斯的社会整合理论促使我们超越对数字技术表面的讨论，深入其结构性矛盾的批判。它揭示出，数字时代的许多弊病并非出自技术本身，而是平台资本主义的技术逻辑与生活世界的交往理性结构性冲突的必然结果。因此，解决的途径不能仅限于对于技术的升级迭代，修修补补，而是要触及更深层次的经济与权力结构，思考如何为生活世界划定不可侵犯的边界，对于算法的全面殖民。

### (二) 为开辟“数字公共领域”确立规范原则

哈贝马斯将公共领域视为系统和生活世界之间的中介，是通过理性商谈形成的公共舆论，进而影响政治的场域。这一理论为开拓数字时代公共领域提供了一套规范性标准。

哈贝马斯社会整合理论提出的“理想言谈情境”为评估和设计数字交往平台提供了规范尺度。尽管

在现实中完全实现是不可能的，但它可以作为一个批判现实、引导改进的标尺。这种原则要求我们重新审视当前的数字平台设计。算法推荐机制是否制造了“信息茧房”，阻碍了不同观点的自由交流？平台的运行规则是否公正透明，还是仅仅服务于商业或政治利益？网络的匿名性是否助长了非理性的攻击而非真诚的对话？

根据这些追问，数字公共领域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建立。第一，制度设计方面、推动算法透明度与可问责性，设计促进观点碰撞而非情绪极化的机制。第二，治理模式方面。倡导数字素养教育，培育公民进行理性、负责任交往的能力。第三，法律规范方面。通过立法确保数字平台的公共属性，使其不仅是商业公司，更需承担起作为社会对话基础设施的社会责任。

### (三) 为构建“数字法治民主”指明制度方向

社会整合的实现需要将生活世界中达成的理性共识转化为具有约束力的、合法的制度。哈贝马斯的“商谈原则”和“程序主义法律范式”为此指明了方向。

哈贝马斯认为，法律的合法性并非来自先验的自然法或纯粹的权力意志，而必须源于所有可能的相关者在理性商谈中的同意。在数字时代，这意味着政治决策与法律制定的合法性，必须建立在经过数字公共领域充分、自主地协商所形成的公共舆论基础之上。

这一理论对当前的数字治理具有双重启示。首先，对民主实践的革新。它倡导利用数字技术拓展和深化协商民主，使更广泛的公众能有效参与立法与决策过程。其次，对技术治理立规。它要求对算法、人工智能等具有规范效力的技术系统进行民主商谈与合法性审查。这种审查的设计逻辑和价值取向必须接受公共领域的审视与辩论，确保其符合公民的共同意志，而非沦为技术官僚的操作。这实质上是要求“将算法关进民主的笼子里”。

哈贝马斯的社会整合理论为数字时代提供的并非具体的操作途径，而是一种强有力的批判武器和清晰的启示。它帮助我们深刻洞察数字时代背后的整合危机根源，并坚定不移地指向一个以交往理性为基石、以未被殖民的生活世界为活力源泉、以充满活力的公共领域为中介、以商谈式民主法治为保障的社会整合愿景。在技术决定论甚嚣尘上的今天，这一理论重申了一个根本立场：数字社会的未来，最终应取决于公民基于自由与理性的沟通所达成的集体自决，而非由技术逻辑或资本力量单向度地塑造。

## 参考文献

- [1] 杨晓光, 郑晓龙. 数字时代的社会治理: 特征、原则与着力点[J]. 国家现代化建设研究, 2023, 2(6): 88-101.
- [2] [德]尤尔根·哈贝马斯. 交往行动理论: 第二卷[M]. 洪佩郁, 蔺菁, 译. 重庆: 重庆出版社, 1994: 174.
- [3] [英]安德鲁·埃德加. 哈贝马斯: 关键概念[M]. 杨礼银, 朱松峰, 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9: 101.
- [4] [德]尤尔根·哈贝马斯. 交往行为理论: 第一卷[M]. 曹卫东,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 [5] [德]尤尔根·哈贝马斯. 在事实与规范之间[M]. 童世骏,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4.
- [6] [德]尤尔根·哈贝马斯. 现代性哲学话语[M]. 曹卫东,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1: 387.